

从白话译本到浅文理译本

——施约瑟两个《雅歌》中译本的比较研究

From Vernacular Version to Easy Wenli Version:
A Comparison of Two Versions of *Song of Songs*
Translated by S. I. J. Schereschewsky

刘 燕

LIU Yan

作者简介

刘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Yan, Professor, The Institute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mail: liuyan@bisu.edu.cn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portions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ong of Songs* by S. I. 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the first Mandarin translation (1874) and an Easy Wenli Version (1902). The comparison aims to reveal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Schereschewsky and shed light on the intercultural nature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analy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ng of Songs* from Mandarin into Easy Wenli,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s Schereschewsky uses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ranslation theory can be seen. He favors, for example, direct translation and faithfulness to the source language, but he also is a reader-oriented translator. He utilizes different Chinese literary styles and dic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biblical genres; and offers authoritative commentaries and annotations when needed. Schereschewsky's two Bible translation versions not only reflect the translatability, the readability, and sinicization and inculturation of the Sacred Word but also reveal Schereschewsky as a vanguard of interliterary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Biblical translati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sinicization, *Song of Songs*, vernacular version, easy wenli version

近二个世纪以来,《雅歌》(又译《所罗门歌》)的汉译经过了近百年的漫长历程,其翻译主体既有传教士也有后来的女性译者。他们依据希伯来语、拉丁语、英语等版本,使用过文言(深文理, High Wenli)、浅文言(浅文理, Easy Wenli)、白话(Vernacular)、方言(Dialect)和现代汉语(Modern Chinese)等语体;采纳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意译(literary translation)、编译(compilation)或某种程度上的文学改写(rewriting);亦有从古诗体(五言)到散文体再到新诗体的文学化渐进过程,体现了圣经文本翻译的调适性、可变性与再塑性,同时也在历史的流变中谱写了一曲中西文化/文学/语言彼此交融与回应的爱之赞歌。

为数众多的《雅歌》中译本,如许地山译本(1921)、吴曙天译本(1930)、陈梦家译本(1932)、吕振中译本(1970)等,皆不同程度地得益于1919年版《圣经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而后者的翻译底版则可追溯到此前的各种《圣经》中译本,尤其是施约瑟(S. I. 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从希伯来语直接翻译为中文的《北京官话旧约圣经》(1874)与《旧新约圣经》(浅文理, 1902)。“在圣经和合译本出现之前,施约瑟的旧约官话本与北京翻译委员会的新约官话译本,显然是使用最广的中文圣经。”^①施约瑟的两个中译本在圣经汉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誉为“40年来无竞争对手”^②。G. 蒂文斯(George Stevens)便称:“施约瑟的《圣经》中译本意义一如威克里夫译本与马丁·路德译本之于英国人和德国人。”^③

^① 伊爱莲:《施约瑟传——犹太裔主教与中文圣经》,胡聪贤译,新北:圣经资源中心,2013年,第334页。[Irene Eber, *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 I. 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trans. HU chong xian (Xinbei: Bible Source Center, 2013), 334.]

^②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34), 82.

^③ George H. Steven, *Jewish Christian Leaders* (London: Oliphants, 1966), 61.

本文比较施约瑟《北京官话旧约圣经》（1874）与《旧新约圣经》（浅文理，1902）中的两个《雅歌》片段，旨在探究其圣经译本的翻译策略与跨语体、跨文化特征，主要涉及：1.凸显翻译主体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语言训练对于圣经翻译的主导作用；2.强调读者需求决定了译者对译入语的选择，如文体、风格、修辞、注释等；3.探讨施约瑟的翻译特色，如译本中的注释、解经法，融合了犹太拉比的“米德拉什”（Midrash）^①传统与中国经典注疏传统，以此作为阐释规范；4.中文圣经翻译不仅是一个跨语体、跨文化的处境化进程，也是日趋世俗化、调适化和本土化的历史过程。20世纪70年代至今涌现的《圣经》新译本不断显明了圣典翻译与阐释的多元维度。

一、施约瑟：多重文化身份的圣经译者

施约瑟是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立陶宛小镇陶罗根（Tauroggen）的美籍犹太人，幼时父母双亡，由同父异母的兄弟抚养。他从小接触到希伯来语和俄语，聪慧好学，具有特殊而敏感的语言天赋，家人希望他成为一名拉比。16岁时他离家就读于乌克兰的日托米尔拉比学校（Rabbinical School of Zhitomir）。当时以解放犹太人、接受西方文化为目的的犹太启蒙运动风靡欧洲，到此地传播福音的伦敦基督教犹太人传道会（The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把《旧约》《新约》译成意第绪语，吸引了一些像施约瑟这样的年轻犹太人。1852年，施约瑟前往德国的布雷斯劳（今弗罗茨瓦夫）大学（Breslau University）攻读东方语言

^① 米德拉什或密德拉西，英语为Midrash，希伯来语为שרדמ，即解释、阐述之意。犹太教讲解《圣经旧约》的布道书卷。公元2世纪已具雏形，6-10世纪成书。全书按《圣经旧约》各卷的顺序编定，对之进行通俗的解释与阐述；每篇可有单独名称，如《出埃及记》的米德拉什。更多信息参考Richard N. Soulen & R. Kendall Soule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3rd ed.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113.

课程，接触到当时德国的现代圣经批评学。1854年6月，施约瑟前往美国纽约，深受犹太裔传教士里德拉博士（M. G. R. Lederer）的影响，在一个逾越节晚上接受浸礼，皈依基督教。后来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市的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 City, Pennsylvania），两年后转往纽约的圣公会总神学院（the Episcopal 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并于1859年7月被授以执事职位。

不久，他以美国圣公会海外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开始学习汉语。1859年12月，施约瑟抵达美国圣公会总部所在地上海，在内地进行了二次远游，体验到不同方言。1862年来到北京，在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公使馆担任翻译。在此后的12年（1862-1874）中，他任职于“北京译经委员会”（The Pek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鉴于施约瑟精通希伯来语和具有犹太文化背景，他被委员会指派将希伯来语《旧约》翻译成北京官话。在1864年写给美国国外布道团委员会（American Foreign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Mission）的信中，施约瑟解释了汉译《圣经》的重要性，提倡把《圣经》翻译为满洲方言（即北京官话），因为它适用于四分之三的国土，是全中国的官员、商人和文人之间的通用语。^①

当时通行中国的圣经译本是深文理译本（High Wenli Version），如最早的马什曼（J. Marshman）译本（1822）、马礼逊（R. Morrison）《神天圣书》（1823）、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 1852）、裨治文（E. C. Bridgman）《新旧约全书》（1864）、高德（J. Coddard）《圣经新旧遗诏全书》（1868）等，另有仅供东南局部地区使用的方言译本（如广东话、厦门话、客家话和吴语等），但没有一本北方方言的译本。随着中西双方的不断接触和时局的发展，情况逐渐得以改变，

^① James Muller, *Apostle of China: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931-1906* (New York: Morehouse Pub. Co., 1937), 66.

“中国教会信徒日益增多，由于教育水平大多不高的关系，在阅读文理译本时感到困难，以致对官话译本的需求渐增。”^① 北方方言作为“官话”，既是清朝的官方权威语言，也是大部分北方普通老百姓使用的语言，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1874年12月，在上海美华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资助下，历时十多年完成的第一个北京官话《施约瑟旧约圣经》出版（由日本京都美华书院印制）；1878年，该译本和1872年已出版的《北京官话旧约圣经》合并成《北京官话旧约圣经》，作为英美两国传教士和圣经公会共同合作的硕果。在1919年《和合本圣经》之前，这个译本是通行最广、最受中国信徒欢迎的官话译本，并为此后的圣经汉译提供了出色的模板。

1877年施约瑟被任命为上海教区第三任主教（Bishop）。1882-1895年间施约瑟在英国剑桥、瑞士日内瓦、美国等地养病，虽饱受病痛折磨，却依然在轮椅中坚持用二个手指翻译，不但继续修订北京官话《旧约圣经》，还将其翻译成浅文理（Easy Wenli Version）。对于外国传教士而言，“19世纪末期，可以说是文言文圣经从深文理向浅文理过渡的中间阶段。对中国人而言，浅显的白话只用于日常生活的口语中，而不运用于文字表达中。对传统文化和文字颇为自负的文人来说，他们更不会接受用这种浅显语言写成的书。”^② 施约瑟以残疾之身独自完成了《和合本圣经》翻译团队花费18年才完成的事业，堪称世界圣经翻译史上的奇迹。

二、从白话到浅文理：两个《雅歌》中译本的比较

与利玛窦等天主教的传教策略一致，施约瑟认为在中国传教的目

^① 蔡锦图：《中国圣经翻译的历史回顾和研究》，载《圣经文学研究》2011年第5辑，第202页。[Choi Kam To Daniel,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in *Bible Literature Studies*, no.5(2011):202.]

^②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50.

的是建立“中国的基督教”（Chinese Christianity），传教士应尊重中国风俗习惯，体悟文化传统、古典文学（如诗词、通俗白话小说和历史哲学）。在1860年的一份报告书中，施约瑟声称：“若要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传教士们必须在讲述时引经据典，唯有如此，才能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表达自己的心灵和精神层面。……应该在向中国人讲道时，像是一名中国人。”^①他认为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各异，汉语的书面语与口语面对的是不同的阅读对象，如果使用形式多样、风格迥异的“合适的文体”（the appropriate style）来翻译《圣经》，则有助于基督教在不同民众中的传播。施约瑟专注于北京官话和浅文理圣经二个译本的工作，目的就是用“合适的文体”面对不同的中国读者，更好地传播福音。施约瑟乃是唯一一个用白话和浅文理二种语体独自汉译圣经的译者。

以下分别是《北京官话旧约圣经》（1874）和浅文理《旧约圣经》（1902）^②二个译本中的《雅歌》（又名《所罗门歌》）第一章：

白话版：

这是所罗门所作的歌中的雅歌、愿他与我接吻、因你的爱情胜于酒醴。你的膏、香味甚美、你的名如倾出的香膏、因此众女子都爱慕你。愿你引导我、我们速速随在你后、王携带我进入宫殿、我们也仍因你欢欣喜悦、称赞你的爱情胜于美酒、他们都诚诚实实爱慕你。耶路撒冷的

^① “Report of S. I. J. Schereschewsky,” 转引自伊爱莲，《施约瑟传——犹太裔主教与中文圣经》，第226页。

^② 本文引用《北京官话旧约圣经》（1874）之《雅歌》由伊爱莲提供给作者，特别感谢她的帮助。《旧约圣经》（浅文理版，上海：上海大美国圣经会，1913年）。[*Jiu xin yue sheng jing*, Easy Wenli Bible, trans. S. I. J. Schereschewsky (Shanghai: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3).]台湾橄榄出版社据此出版了影印版（2005）。圣约翰科技大学校长杨敦和在影印版序中言及：“只可惜后来由于中国战乱不已，加以年代久远，这一部巨著竟然失散零落，除了大英图书馆保存了一套之外，全球已不剩几部完整的版本了。”

众女子、我颜色虽黑、却仍秀美、我虽如基达的帷幕、却仍似所罗门的帐幔、我受日晒、颜色微黑、休要藐视我、我同母的兄弟向我发怒、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请你告诉我、你在何处放羊、午间在何方使羊歇息、免得我在你同伴的羊群中来往游行。女子中至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踪迹、将你的绵羊羔放在牧人的帐幕旁。我的佳偶、我看你如法老辇上的骏马。你脸有珠串妆饰、你颈戴珍珠项圈、甚为美观。我要为你作金串、嵌上银星。王正坐席时、我的那珥达发出香味。我看我所亲爱的、如没药香囊常在我怀中。我看我所亲爱的、如古珀露花生在隐基底葡萄园中。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眼犹如鸽眼。我的良人、你也俊美、也甚可爱、我们床榻也青绿。我们房屋的栋梁都是香柏、我们护墙的花板都是松木。

浅文理版：

此所罗门之歌中歌也、惟愿与我接吻、尔眷爱之情、胜于酒醴、尔之膏、馨香甚美、尔名如香膏倾注于外、故众女爱尔、愿尔引我、我侪趋于尔后、王携我入其宫室、我侪因尔欢欣喜悦、念尔眷爱之情、胜于酒醴、彼众诚然爱尔、耶路撒冷众女乎、我颜虽黑、容乃秀美、虽如基达之幕、仍似所罗门之幔、我受日暴、色虽微黑、毋藐视我、昔同母之兄弟怒我、使我守葡萄园、我之葡萄园、反不得守、我心所爱者、请尔告我、尔于何所牧羊、亭午在何方使羊憩息、免我在尔同伴之群中、往来游行、女中最丽者、如尔不知、则随群羊之迹、以山羊之羔、牧于牧人之幕旁、我之佳偶、我视尔如法老驾车之骏马、尔脸饰以璎珞、尔项垂以珠串、甚为美观、我

我为尔作金璎珞、嵌以银星、王坐席间、我之那珥达发
其馨香、我所亲爱者、我视如没药香囊、恒在我怀中、
我所亲爱者、我视如古珀露花、生于隐基底葡萄园中、
我之佳偶、尔甚美丽、尔甚美丽、尔眼犹如鸽眼、我之良
人、尔亦俊美、亦甚可爱、我倚之床、亦青亦绿、我室之
梁、制以柏香木、饰墙之板、制以柏木……

通过比较《雅歌》二个译本在读者对象、文体、风格与注释等方面的差异，可以探寻施约瑟的圣经翻译策略与效果。

1. 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目标

施约瑟很早就意识到圣经的翻译目标是为日常生活中的中国读者提供易于阅读与理解、发问与讨论的译本。其官话（白话）版与浅文理版圣经可以满足不同的阅读对象，前者服务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读者（或给不识字的文盲听见），后者服务于士大夫或精英阶层。通过对比上述译文，我们清楚看到，官话版《雅歌》的遣词造句口语化，通俗易懂，情感浓烈，富于浪漫抒情色彩。相比之下，浅文理版《雅歌》使用书面语，力求典雅，情感含蓄敦厚。如用“眷爱”代替“爱慕”“牧养”代替“放羊”等。希伯来《雅歌》的主要诗体是排比和头韵，没有使用韵脚，这与中文诗善用谐音字、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较为接近。

在《雅歌》时，施约瑟的二个译本都使用了大量排比和对偶句式，尽力保留原文优美典雅的诗意风格。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中国译者）可采用历史悠久的词汇，而无需填补词典的空白，不像欧洲后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家，他们要把圣经翻译成新兴的未来民族语言。……汉语诗歌和散文写作传统中具有丰富的排比运用，以及一套相对受限的音节，完全适合用来对调希伯来语《雅歌》的艺术手法。”^① 这似乎从

另一个角度说明汉语与希伯来语在抒情表意、修辞上的接近有助于《旧约》的翻译，尤其是那些富有诗意的篇章。从以上的译文中，我们看到这种清晰而不晦涩、优美而动人的翻译风格，这证明了施约瑟不仅熟悉希伯来圣经原文、经义解释及如何把它们转化成新的汉语语法，而且考虑到了汉语之美、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2. 采纳风格各异的语体形式

这二个译本皆采用地道的归化语言。官话版《雅歌》力求让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理解接受，采用北京官话，追求口语化，富有节奏，适合朗诵。浅文理《雅歌》文白交加，单音词代替了双音词，如“幕”代替“帷幕”“幔”代替“帐幔”“守”代替“看守”等。在人称代词上，用文言文的“尔”代替“你”“彼众”代替“他们”“我侪”代替“我们”。在连接词或虚词上，用“之”或“者”字代替“的”“故”代替“因此”“于”代替“在”等。同时，“之”“亦”“惟”等文言表达赋予《雅歌》诗意色彩。在句法结构上，官话版突出主语“我”，语法完整，接近日常口语；浅文理版更为简约，往往省略主语，切合文言文的书面表达方式。例如，官话版“我同母的兄弟向我发怒”转换为浅文理版“昔同母之兄弟怒我”，后者省略了主语代名词“我的”，用“怒”代替“向……发怒”。概言之，施约瑟发明了一套浅文理替代白话的语法规则，适用于整本圣经语汇的转换。

3. 塑造诗意化的语言风格

施约瑟十分尊重中国文学传统，对中文保持高度敏感。《雅歌》作为《旧约》中风格最抒情、情感最热烈的一部，其译文最能体现译

^① Raoul David Findeisen, “God Was Their Souls ’Love, Women Their Bodies’: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ong of Songs* (1930/32),” in *Talking Literature: Essays on Chinese and Biblical Writings and Their Interaction*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13), 133-34.

者的文学修养。在翻译过程中，施约瑟小心选择让受众容易接受、了解的语言形式，根据汉字蕴含的文意为宗教意念赋形，追求精炼典雅的文学效果，大量使用成语或惯用语、对偶句，如用“馨香”代替“香味”“诚然”代替“诚诚实实”等。在个别词语的翻译上，浅文理版更为精准，如《雅歌》1:8用“山羊之羔”代替“绵羊羔”，切合对“goat”的翻译（和合本翻译为：“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棚的旁边”）。又如，对于地理、物质、日常生活的专用名词，施约瑟采用“音译法”“合成词”，既有效传达了原文的韵律，又为中文增添不少新词，如“没药”（myrrh）“那珥达”（和合本译为“哪哒”）、隐基底（En Gedi）等特殊词汇或音译新词极大丰富了现代汉语，促进了中文白话句法的变革及其欧化的表达方式。

4. 使用标点、字体、序号与注释

施约瑟的圣经译本皆为传统的文言文竖版排列。官话版《雅歌》采用顿号和句号，字体较大，旁边用“一二三”等序号表明每一章的节数。浅文理《雅歌》一律采用顿号而无句号，除每行旁边用“一二三”等序号标明每一章的节数外，还用“甲乙丙丁”等标明脚注次序，便于读者查询《雅歌》与其他圣经章节的关联。正文的顶注（教会的神学释义）、旁注和文中注，构成了文本间的循环阐释，帮助读者研读圣经，尤其是浅文理版本的文白相夹的典雅语体、大量注释与参考，有助于社会精英深究圣经义理。施约瑟在寻求目标语言中的合适词语时，在第一时间内可能不太容易发现两者之间的语义差异，而随着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加深，对各种圣经版本资料更加熟稔，他对译本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

浅文理译本在语体风格上的整体转变和在注释上的殚精竭力，对圣经汉译贡献巨大。遗憾的是，《和合本圣经》虽借鉴了施约瑟译本的硕果，却删去了许多注释和参考标示，而且伴随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它逐渐遮蔽了施约瑟的开拓之功。

三、《圣经》的中国化：施约瑟的翻译策略

译者既要关切自身与他者的文化，又要了解译文所面对的读者群及其需求。为了更好地传播福音，传教士在翻译圣经时必然要考虑到译入国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读者需求。施约瑟主张传教士为本土文化服务，不能破坏中国“民族特色”，不可在中国特性之外强加任何“外国特性”，而且要极力避免使中国人“脱离自己的社会和公民表达方式，脱离他们生兹在兹的政治体”，“不要让他改换服装、事物、习惯和习俗，疏离家庭关系，违背公民义务……应完整无缺地保留其本土身份”^①。他的二个圣经译本不仅充分体现了汉语传达“神旨”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调适性（suitability）与可读性（readability），而且激发了中西文化在圣经诠释上的对话性。

1. 可译性：忠于原始文本的意译

圣经翻译关涉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释，其目标是尽可能让预期的读者理解原文。施约瑟曾多次婉拒1890年中国基督教传教士代表大会邀请他参与官话和浅文理圣经版本翻译的工作，声称新译者们的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汉语的水平不可能超过他本人和北京译经委员会成员，不能指望新译本会超过自己的译本，故只需修订既有译本，无需重译。^②事实证明，《和合本圣经》的确得益于施约瑟的译本。最近的研究表明，那些来自英语圣经版本的汉译本，可能容易引发一些关键性的错误，引发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例如，《圣经》中的“tannin”，希伯来文的原意为“海怪”，希腊文、七十子本与英语钦定本翻译为

^① “Consecration of the Missionary Bishop of Shanghai,” *Spirit of Missions*, no. 42 (December 1877): 672.

^② James Muller, *Apostle of China: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931-1906* (Morehouse Publication Co., 1937), 226-227.

“dragon”，中文依此译为“龙”，这导致了“一种压迫性的基督教观念：圣经中的上帝长期与中国文化争战，制裁着中国文化和宗教的罪恶。”^① 遗憾的是，可能是受前期译本的影响，这种“误译”连施约瑟本人也没有避免。总体上，比起《和合本圣经》，施约瑟译本的权威性与可靠性在于其依据希伯来文原本和希腊文原本，例如，用“夏娃”翻译希伯来语的“Hava”（英语Eva）；根据具体语境用“国”“地”或“地方”翻译希伯来语的“eretz”（英语land /country）等。

《圣经》翻译研究专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了翻译的“动态或功能的对等”（dynamic or functional equivalence），强调“信息在译入语使用者中的可交流与可理解性”，翻译意味着交流，取决于听或看译文的人能了解到什么。^② 施约瑟的翻译策略与奈达可谓异曲同工，他坚持翻译者要熟悉翻译的原文和译入国的文化、习俗，才能找到适合的对等表达。在1874年版《官话旧约圣经》序言中，施约瑟明确提出：“译以官话，书中定义悉照原本不敢增减一字。无非曰译者易也，易字画而已，读者勿以浅显而藐视之。”^③ 他并不拘泥于字义，而是特别注重汉语的表达方式：“按字面义译成中文是错误的翻译，不符合语言惯用法。翻译应该是恰到好处，不拘于表面文字；其风格清澈明了，且合乎目标语的习惯用语。”^④ 施约瑟

^① 李焱昌：《多神与一神之张力：圣经翻译处境化的商榷》，载《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6页。[Archie Lee, “Between Polytheism and Monotheism: Translating Bible in Contextual Cultural Negotiation,” in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no.1(2013): 16. 该文还指出“从‘dragon’的翻译来看，施约瑟比之前诸如1852年的委办译本等版本使用了更多的‘龙’字。”可见，施约瑟也沿袭了前人对“龙”的译名。

^② J. O.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9), 349.

^③ 施约瑟：《官话旧约圣经》，上海美华圣经公会，1874年，例言。[*Guan hua jiu yue sheng jing*, trans. S. I. J. Schereschewsky (Shanghai: Shanghai mei hua sheng jing gong hui, 1874), preface.]

^④ S. I. J. Schereschewsky,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Chinese,” *Records of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41-42.

提出了一套忠于原文的可译性与可解性的意译原则：“他坚信在不直译的情况下仍可能忠实于原文，而且重现圣经的风格和诗情，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维护诗歌和散文之间的差异，这也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① 在希伯来文经文具有暗示性意涵时，施约瑟往往避免照字直译，而采用符合惯用语法的更明白易懂的诗意表达方式，如“My soul failed when he spoke”（《雅歌》5：6），施约瑟翻译为成语“神不守舍”。如果没有对等词汇，他便根据希伯来的原文发音，新造中文词汇，并赋予其特殊的趣味与表述，从而形成了施约瑟自成一体的圣经诗意风格。

2. 可读性：多样的翻译语体与风格

成功的翻译是以读者接受为导向，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接纳与传播。译者既要关切其自身的文化特色，又要了解译入国的读者群及其所关注的问题。施约瑟之所以重视白话、各种方言和不同的中文语体，是因为普通读者而非仅仅是精英人士成为福音的主要阅读者，翻译要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信徒和接受者对《圣经》的阅读需求。试比较以下《雅歌》8：6-7中最著名的一段翻译。

官话版：求你将我放在你心、如你带的印、如你臂上带的印、因为爱心坚强、至死不息、爱的切情极其固结、入墓难消、爱情甚急、犹如大火、仿佛烈焰。大水不能熄灭爱情，江河也不能冲没，人虽将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也必被人藐视。

浅文理版：愿尔怀我于心如佩印、如佩印于臂、因爱强如死、由爱而生之妒心、酷如示阿勒（示阿勒有译

^① S. I. J. Schereschewsky,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Chinese,”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41-42.

黄泉有译阴府有译坟墓)、爱情之烈、如火如巨焰(因爱强如死由爱而生之妒心酷如示阿勒、爱情之烈如火如巨焰或作因爱情坚强至死不息、爱情极其固结入墓难消、爱情甚急如巨火如烈焰)、大水不能灭之、江河不能冲之、人虽以家之全业易爱、亦必被藐视。

和合本: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 带在你臂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 是火焰的电光, 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

在以上引文中, 官话版和和合本直接使用了“墓”“阴间”, 浅文理版则将希伯来语“*Sheol*”音译为“示阿勒”, 并用文中注来解释爱情强度与“示阿勒”的关系。对于那些意欲钻研《雅歌》修辞与隐喻的高层次读者, 这些注释很有帮助。

郭沫若认为“一部《新旧约全书》不知道有多少译本, 单是我们中国所有的便有文言、有官话、有甬白、有苏白、更有注音字母的。他们广来翻译, 惟恐其不普及, 惟恐一般人难以接近, 基督之所以能传播世界, 这种通俗化的办法实在是最有力的因素”^①。可见, 《圣经》译本越来越走向通俗化或世俗化, 从文言文、浅文理、官话再到现代汉语。施约瑟力求让圣经“中国化”, 让译文“本色化”, 符合这一历史趋势。

3. 注释的可解性: 多元的阐释空间

在译者发挥主体性的同时, 译入语的文化传统和语言规范也制约

^①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GUO Moruo, *Moruo wen ji*, vol.10 (Beijing: Renmin Press, 1986), 56.]

着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和决策。注释是施约瑟译本的重要特征与翻译特色，它一方面有助于规范译文、读者、译者之间的理解框架，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译者与读者、读者与经文之间的对话与批评空间，通过“或作”“或译”的方式，译者标明了翻译与阐释的可能性，施约瑟后期用“神”“上帝”或“天主”来翻译“God/Lord”，体现了这一点。

比起官话版，浅文理版的注释或索引更多，正文中添加了大量的文中注，使内容更充实、资料更全面、论证更充分。浅文理版《雅歌》中的文中注可分为几类：（1）具备了词典的某些解释功能，便于读者理解上一个词或句子的相关意义，如《雅歌》1：4“念尔眷爱之情、胜于酒醴”，“念”的文中注是“念或作称赞”。在此，“称赞”解释或替换了“念”，官话版《雅歌1：4》便是“称赞你的爱情胜于美酒”。（2）具有进一步的阐释功能，规定了对某些文本的理解。如浅文理版《雅歌》1：4：“彼众诚然爱尔”，文中注为：“彼众诚然爱尔或作丽人恋爱尔者亦其宜也”。“亦其宜也”是译者对原文中“爱情”之魅力的一种补充说明。（3）具有扩展或说明的功能，在使用汉语时，进一步补充希伯来原文之意。如浅文理版《雅歌》2：3：“我喜坐其荫下、以其果之味为甘”，文中注为：“以其果之味为甘原文作其果甘于我上颚”。《雅歌》2：4：“引导我入宴所、披我以宠爱”，文中注为：“披我以宠爱或作宠爱我如以旗遮蔽我”。在此，“或作”等标明了译文与原文的差异。读者通过阅读文中注，理解了原文中不可传达或模糊的地方。（4）对希伯来特殊地名、人名或计量单位等特殊语境加以说明，避免了读者误读。如浅文理版《雅歌》8：12的“尔得一千”“守者可得二百”，文中注说明舍克勒（Shekel）是以色列当时的计量单位（官话版则无注），有助于中国读者避免将其混同于中国的“千”，进而熟悉圣经的历史语境。

《雅歌》中译本的注解不仅提供了对爱情诗所蕴含的隐喻的启示性解读，回避了译文可能导致的误解，而且也弥补了原本语言与目标

语言之间语法的模糊性和弹性，在规范限制与开放自由之间提供了对圣典的多元阐释。但对于非基督徒读者而言，导读或注释可以被忽略，《雅歌》可以直接被视为世俗的爱情诗；反之，这些阐释或注释亦可引发不同的争辩和对圣经的批评性理解。可见，施约瑟不知不觉地把犹太教的“塔木德”传统与中国古籍的注疏传统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结合。

四、施约瑟圣经翻译的中犹跨文化对话

英国翻译家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受文化、文学、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故《圣经》翻译史就是一部“缩微了的西方文化史”。^① 神学家拉明·桑纳 (Lamin Sanneh) 指出翻译是教会的胎记和传教的基准，他十分强调“基督教的本土语言性”及“福音的可译性”：“可翻译与否，是以文化的共存性为前提，并且设定语言是多元的，这样才能翻译出神的话语来。”^② 由此而言，《圣经》汉译史亦是一部自唐代以来近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缩微版。《圣经》在中国被大规模翻译、传播与阅读，印证了东西文化在近二百年中不断适应、开放、对话、融合、再创新的极其缓慢而复杂的进程。施约瑟恰逢其时，其圣经翻译的独特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多元化的文化身份与出色的语言天赋，具有开放与包容的博大胸襟，善于与中国学者（包括参与的同工）之间保持密切合作和学术对话，尊重中国文化和语言的悠久传统，强调基督教的中国化、本土化与圣经的可译性、可读性，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调适性和对话性。

在中国从事圣经翻译的神圣使命赋予了既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

^①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46.

^② Lamin Sanneh, *Translation the Messag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Culture*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1989), 205.

的施约瑟以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或者正是在中国、在中文圣经中，四处漂泊、身份游移的施约瑟最终找到了心灵的皈依和伟大使命的栖息地。同属犹太人的以色列汉学家伊爱莲洞察到其中的奥秘：“他知道自己一生必定处于这两种文化之间，而当时他已不再伫足于自己的文化中，于是希望精通中文的语言和书写，其实是一种表达归属的方式。”^① 在中国的古老之门被迫向外打开的年代，施约瑟徙居中国，通过翻译圣经、传播福音与筹办大学，开启了希伯来（以色列）—中国两个古老民族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如今，当我们打开白话中文圣经时，应铭记施约瑟的翻译硕果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贡献，并让这份长期被湮没、被遗忘的珍贵遗产得到“光与真理”的照亮。^②

^① 伊爱莲：《施约瑟传——犹太裔主教与中文圣经》，第226页。

^② 1873年，施约瑟与包约翰协力，历时三年翻译出版甘立宗派官话本《公祷书》（Prayer Book）；他还把福音书翻译为蒙古文。1879年施约瑟在上海将圣公会下属的两所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为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1905名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等校之前身），首创校训“光与真理”（Light and Truth），如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中的“怀施堂”（现名“韬奋楼”）即为纪念施约瑟而建。1952年，历时73年的圣约翰大学在大陆被拆散，其复校为1967年10月台湾新埔工专（2005年改名为圣约翰科技大学），美国渥克兰圣公会救主堂特地赠送施约瑟《旧新约圣经》（1913年）祝贺，如今施版《圣经》成为该校镇校之宝。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roomhall, Marshall. *The Bible in China*.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34.
- Barnstone, Willis. *The Poetic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Findeisen, Raoul David. "God Was Their Souls' Love, Women Their Bodies':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ong of Songs* (1930/32)." In *Talking Literature: Essays on Chinese and Biblical Writings and Their Interaction*.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13.
- Muller, James. *Apostle of China: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931-1906*. New York: Morehouse Pub Co., 1937.
- Steven, George H. *Jewish Christian Leaders*. London: Oliphants, 1966.
- Sanneh, Lamin. *Translation the Messag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Culture*.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1989.
- Soulen, Richard N. & R. Kendall Soule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3rd ed.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 Zetzsche, J. O.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9.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蔡锦图：《中国圣经翻译的历史回顾和研究》，载《圣经文学研究》2011年第5辑，第196-220页。[Choi, Kam To Daniel.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In *Bible Literature Studies*. no.5(2011): 196-220.]
- 蔡锦图编注：《遗珠拾穗：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圣经选辑》，新北：橄榄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编注者序第1页。[Choi, Kam To Daniel ed. *Gleaning in the Undiscovered Talent: Selections of the Protestant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Xinbei: Olive Publishing Ltd., 2014.]
-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GUO Moruo. *Moruo wen j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oruo), vol.10. Beijing: Renmin Press, 1986.]
- 李焯昌：《多神与一神之张力：圣经翻译处境化的商榷》，载《深圳大学学报》

- 2013年第1期，第12-18页。[Lee, Chi Chung Archie. "Between Polytheism and Monotheism: Translating Bible in Contextual Cultural Negotiation." In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no.1 (2013):12-18.]
- 施约瑟译：《官话旧约圣经》，上海：上海美华圣经公会，1874年。[*Guan hua jiu yue sheng jing*. Translated by S. I. J. Schereschewsky. Shanghai: Shanghai mei hua sheng jing gong hui, 1874.]
- 施约瑟译：《旧新约圣经》（浅文理版），上海：上海大美国圣经会，1913年。[*Jiu xin yue sheng jing* (Easy Wenli Bible). Translated by S. I. J. Schereschewsky. Shanghai: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3.]
- 伊爱莲：《施约瑟传——犹太裔主教与中文圣经》，胡聪贤译，新北：圣经资源中心，2013年。[Irene Eber. *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 S. I. 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Translated by HU chong xian. Xinbei: Bible Source Center, 2013.]
-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最初发表于1921年12卷1号《小说月报》，又载《艺术与生活》，上海：岳麓书社，1989年。[ZHOU Zuoren. "Bibl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Xiao shuo yue bao*. No.12(1921): 1. Also in *Yishu yu shenghuo*. Shanghai: Yue lu shu she, 1989.]
- 朱自清：《新诗杂话》，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ZHU Ziqing *Xin shi za hua*. Hefei: Anhui Wenyi Press, 1999.]